

英德文史資料
(13)

依稀往事難忘
貶英德

政協英德市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二〇〇〇年六月

依稀往事难忘贬英德

吴健民

英德文史资料(13)
依稀往事难忘贬英德

政协英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广东省阳山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32 开本 45000 字

2000 年 6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2000〕粤印准字

第 0108 号

作者简介

吴健民同志，广东惠来人，1921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县委书记，潮汕特委委员、韩江地委副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一支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四支队副政委、政委。全国解放后，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半，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等职。改革开放初期任中共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后任中共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笔耕不辍，已出版《趣途万里》、《血沃劲草》、《百岛之滨》、《从河内到旧金山》、《掇瓦集》、《骄我河山》、《温故集》、《党史浪花集》、《创办珠海特区五年的回忆》等著作。

依稀往事难忘贬英德

吴健民

英德是个好地方。它是有山有水、美丽的北江之城；是被称为代表中国华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考古胜地。1960年春夏间，我有缘到英德住下，头尾将近两年。

问我是怎么去的？我说是贬去、不是调去的。所以，当年对英德的历史文化，并没有顾及做什么调查研究，对绮丽的风光，也没有旅游的心情去赏识。

我后来才读到誉称“南宋四家”的著名诗人杨万里南来曾有赞美英德诗句：“清远虽佳未足观，浈阳佳绝冠南峦。一泉岭背悬崖出，乱洒江边怪石间。”可惜那时候我哪有什么赏诗的意境？！

这段经历，确是令人终生难忘。它实实在在地记载着解放后紧密的政治运动某些片断，也反映了党的政治生活中某些带着血泪的教训。

……这个，还得让我从头说起。

淡淡的云彩淡淡的风，天幕下面九月的广州，在1959年这一年，还不算太炎热。可是，人间的政

治斗争，却可算得是火焰炙人的时节了。

大跃进的高峰期——1958年下半年，我奉命带专家小组到越南去帮助搞他们北方的水产建设规划。国内一切火辣辣的过程，我都没有机会参加。回国的時候，已是1958年的12月。当时，我还是满怀信心地想看到集体渔业高举三面红旗的好形势的。

吃罪于包产到船

由于历史命运的安排，我自1953年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工作，就参予广东省渔业合作化筹划（包括酝酿、准备）。对于海洋捕捞渔业，自认应该边学边干。因此，几年的时间，曾调查走过了全省沿海渔港，对集体渔业的分配问题，生产责任制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当时自己的看法是，合作化之后的海洋捕捞集体渔业，要使他们的生产得到较好的发展，就要调动集体渔民的生产积极性，应在生产的基本作业单位实行定额管理责任制。具体地说，就是对基本作业单位（一艘或一对大渔船或几条小渔船联合的作业组），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简称为“包产到船”。这样做，可以使渔船上劳动者的分配，同捕捞作业创高产挂上钩。做到多劳可多得，有效的技术创新多可

多得，管理更合理、劳动协作更优化也可多得。（具体的“三包到船”内容，在这里就不多说了）。①

1959年5月，水产厅会议上，厅长正面提出海洋捕捞集体渔业的分配制度，应搞固定工资制。这对于我这个副厅长的“包产到船”，分明是形成针锋相对的两种主张。本来，在海洋渔业经营管理广泛的理论领域里，探讨分配问题、责任制问题，以至整个体制革新问题，出现不同看法，完全是正常的。也应允许展开研究、争论的。学术或理论上的问题，百家争鸣嘛。

对于我来说，当不同主张的一方，其阐明的道理，还未能说服我的时候；或者在争论中，我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观点哪些方面有错误；这时候，我确实不会收回自己的意见。这个，本来完全不涉及副职不尊重正职的问题。也不会涉及自高自大“不守规矩”这类问题。也许，刚好碰上大气候有变化，省委书记指示要发起“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于是，争论还没有认真展开，我的“包产到船”就“顺理成章”地列入反右倾的范围。

说也奇怪，这场斗争成熟得挺快，只消半年时光，这个“包产到船，复辟资本主义”的结论就定

①可参见吴人建：《南海渔业和渔业合作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另《集体渔业生产管理的责任制和政治工作》一文，也可见《撮瓦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第85页

了。当然，为了治罪，还得加上其他的罪状。最后治罪的结论是：划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原来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工资降一级。

结论书是开大会宣布前的一小时才给我看的，也没有要求我签字。主持反右倾的负责人其眼神好象在说：你签不签字无关重要，反正结论是不能改的。

我热泪夺眶而出，痴呆地站在毛主席像前面，想着“……毛主席！你能为我主持个公道么！？……”

我开始体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除本人的思想水平之外，还需要外部条件。在这样的狂风恶浪中，要坚持真理，是多么难！

当然，二、三十次大小会的斗争中，我确实曾经怀疑自己这“包产到船”的主张可能是不符合中央政策的，因而是错误的。但是，我又无论如何回答不了究竟违背那几条，错在哪里？

这种愿意认错而又在理论上未理解错误所在的心态，使我陷入极端痛苦之中。而当我意识到干部队伍中确有少数人，生有一副媚骨，长着政客嘴脸，又不知从哪里学来一套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的权术。我为党风存在的这一创伤更感到痛楚中又加了一刀。

李子元、安平生、赵紫阳等同志都分别约我谈话。我也毫无保留地摆开对渔业责任制以及水产工作方针等的看法，坦率地表示不同意对我治罪的结论。我愤怒地指出党内斗争已有多年的教训，为什么现在仍然可以用一、二人未经查证的话来作为处分的依据？……可是，他们都叫我应该接受这个结论，检查自己。

反右倾运动对省直属机关完全是按整体部署进行的统一的运动，当然不能因水产厅我这个“包产到船”案拖着而耽误时间。所以，我知道申诉是无效的。赵紫阳的谈话就是一个终点。我确实横下一条心，不申诉。只怪自己水平低，还不认识错误的所在，那就慢慢作自我反省吧。

下英德去当社员

果然宣布结论后不到两周，即传来消息，要我准备下放英德去当社员。我强忍住内心的颤痛，眼看身边一群稚幼的孩子和身体孱弱的妻子，感到无限内疚，——妻儿们都是受连累的啊！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有什么办法？……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要挺住。我不能倒下。

下放当社员，想必主要是劳动改造。掂量着自己的劳动能力：拿锄头，臂力一般，耐力不足，还

可以应付；挑担子的肩力则缺少锻炼，是一弱点。所以，我找来二个竹筐，系上绳子，筐底铺上旧被单，一个竹筐叫最小的女儿黎娃坐上去，另一个竹筐拿一叠书籍放入，放到两筐重量平衡了，套上扁担就挑起来了。就这样挑着这担子在楼上走着绕圈子，一圈，两圈，三圈……开始，挑担绕了二十圈，已气喘呼呼。挑了三天，肩膀开始有点红肿。但是，坚持下去，圈数已增加到三十圈、四十圈。孩子高兴，我也高兴。

孩子是天真的，看着好玩，老四黎光（男孩）争着要坐筐。我搬开书册，让老四坐上去，哥哥比妹妹重些，就在妹妹的一边加一些书。这回，挑起来份量就不同了，也许有六、七十斤一担。还行，继续坚持锻炼。肩膀继续作痛，孩子却玩的很开心，还帮着数圈。是有进步，最高记录我走了五十圈。

看着两个孩子的笑脸，我以孩子没有受到政治斗争的心理伤害而欣慰。我知道应该不让孩子知道爸爸内心的痛苦。现在，他们是在鼓励着爸爸提高体力劳动的能力。

有一天，正在进行“室内锻炼”，忽然楼下有谁喊了一声“奶奶来了”。原来是革命母亲李梨英阿姆（“阿姆”，是潮汕对母亲一辈老人的尊

称。)从汕头来看我。

阿姆坐定，脸色很不好看。她说：“想不到你们水产厅……这么难进。我要来看你，还在门口七问八问，好象盘查什么似的……”

我将情况向她解释了。她老人家的气仍未消，接着说：“我大声告诉他们：我要看我的儿子，你们的副厅长某某人！传达室内有一人说：没有听说吴厅长还有母亲……我生气了，就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后生人，什么都不懂！——就进来了。”

我又将运动已做结论的简况给她老人作了介绍，并安慰了一番。但是，我不得不如实地告诉她可能下放到英德农村去，全家都搬去。

阿姆摇着头，沉着脸，凄然落泪。我知道她有许多话要对我说，看着眼前这种情景，她说不出了。但是，她坐了很久，不愿离去。后来，她语重心长地说：“阿成！（阿姆叫我地下活动时的化名）现在的世道，我也不明白是怎样变的。有些人就是不承认俺这批死存的人经历千辛万苦，完全是一心为革命。动不动就说反对了上级的哪一条，反对了上面某某人，硬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就是什么‘主义’……我老人今年71岁了，虽然不象你们那样管着国家大事，但是，也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会说阿姆也是什么‘主义’。当然，我不怕，阿姆和

你们一样也是企（站）得正的人！”

阿姆越说越激动，也越发伤心。但是，她还仍然鼓励我：“阿成！你要有志气做人。下乡后，就象以前在山上那样，要捱得苦。不可消极、失望。相信毛主席最后会公正评说这辈忠臣的。好人就是好人啦……”

我留她老人家吃过再走。她呜咽着说：“不吃了。阿姆心内艰苦（痛苦），吃不下。想不到你又要下放了……今后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相见……”这时候，她老人家哭出声了。

真的料不到，这次见面竟成了同阿姆最后的一次晤谈。后来，李梨英逝世，我下放在乡下，连参加她的追悼会的权利也被剥夺。

1960年3月27日，省委反右倾领导小组正式通知我下放英德的决定。于是，我办了介绍手续先到英德去了解情况。英德县委书记刘志祥见面时很热情，说：“欢迎老同志到英德来。”我顿时象炎夏走路碰上有人送杯水解渴那样的感到一阵欣慰。因为我是准备碰遇冷面孔的。

我说：“我是戴上帽子来这里改造的。”

“知道了，我们已接到通知。你的工作，我看还是在靠近县城的地方安排为好。家搬来了再定。你家小孩小，你爱人原来是省委农村部的干部，就

留在县委农业办公室，好照顾孩子。”刘志祥的话，给人品尝出其中的人情味来。

谈了片刻，就定在四月四日全家搬下英德。那个时候，市场供应已非常紧张，还有时悄悄地传来一些某地饿死人的消息。

英德是处在北江中游，又是北江同翁江、连江三江的交汇处，这个地方文化古迹甚多，而历史上又是开展革命斗争较早的老区。昔年，即为社会公认的一处史前初期考古重点。大家都说这里岩溶地貌，摩崖石刻比比皆是，确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美丽山区。可是，我全家携老带小贬到这里，当然无法顾及这些。

大队养猪场饲养员生活

到英德后，知道县委确定我到大站公社江南大队养猪场工作。家即设在县委院子内的平房宿舍。联系中，县委副书记、县长任金钟也谈得挺亲切。我知道自己经常带着自卑心理，与当地大小官员晤面，只求不带蔑视的眼光就满足矣。县委组织部长是个年轻人，从他讲话的腔势看，他的办事是永远满怀信心的。他对我不说江南大队，只说定在大站公社，具体工作由公社去定。

自从入了英德，我不断告诫自己：应该夹着尾

巴做人。就是有一条做不到，如果要我媚笑、折腰，肯定要遭到个性的抵制。有什么办法呢？本性就是难移。骨头硬了不能变软。

我拿着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大站公社去找饶克奎书记。他说已定在江南大队，大队支部书记叫徐超功。我表示明天即去大队报到。

江南大队在英德城南面，隔着北江与县城相望。这一天，江面刮着阵阵南风，我寻问到驳在大同尾的过江渡船，随着渡公艰苦地顶着风撑竿前进，我踏上当社员的第一站。

上岸走六、七里路，大队办公室就在一处旷场角落的独立小楼里，楼下空着，楼上却堆着数十包农用杀虫粉，中间放着一张看来从没有人在上面办公的桌子，因为灰尘已经使人看不清桌面的颜色。靠窗口小桌旁的两个大队办事人员说徐超功书记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会，便下楼到周围村里走走。

大队部小楼的南边就是一个养猪场，我从猪场旁边经过，只见简陋的猪栏养着许多头母猪。顺着村旁的小路走到村口的水田（后来才知道这村叫做成屋），见几个农民在田头干活。反正没有事，我帮他们挑了几担粪下田作基肥。又见另外一片水田已开始插秧，便参加到秧田拔秧送到插秧的田里。

一位农妇瞧着我用惊奇的眼光问道：“同志，你是外地来的……？”

“是的，我是来你们江南大队的下放干部。”

“哦，是下放干部。”

“你们这里往年都是这时候插秧吗？”我的印象是粤北插秧的时间较迟，所以问问。

“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前天才是清明。”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农回答。又说：“说是提倡早插，那是还要看天气呢！现在个个都吃不饱，无气无力，许多事说着我们做不到。”

“你们不是办了集体食堂么？”我这就是死顽固，明明这食堂是个敏感的问题，我偏偏要去提这件事，也不怕又是触及右倾这伤疤。

“办了。集体食堂一日两餐稀饭，谁顶得住？！”

“一家人，有老有少，有时还有病痛的，顿顿是这么几碗粥，让我们怎样过日？……”

“人人种作都是希望收成好，吃得饱，日子过得安乐。可是，收有多少粮食？粮食到哪里去了？我们都不清楚。现在这么捱法，惨啰！”

想不到这么一问，却引来许多农民的呼声。突然间，我又感到这个吃不饱的问题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联系上了。心里一阵难过。……远处有

人朝我这边高喊“吴同志——！”我知道是超功回来了，便告辞社员们走了。

徐超功说让我到养猪场劳动。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养猪场。我带着几件衣服和一张小棉被这小袋行李，离开大队进入江南大队养猪场。

这是用破糖寮改造过来的养猪场。共养了16头母猪，3头公猪，和45只仔猪；是繁殖仔猪供应大队各农户猪苗的养猪场。场长黄世元，贫农出身，共产党员。他并不在场住宿、开膳，也不参加劳动。其他工作人员有莫宗房等13人。

我着手安置自己的住宿点：就在这个脏乱不堪的糖寮草棚里，靠近二破灶上面，清理了那个木头搭成的小阁楼，硬在那一大堆杂物和布满蜘蛛网伴着厚厚的灰尘中，挤出一个睡觉的床位。从此，我开始了当饲养员的新生活。晚上听着破灶里成群的老鼠出来追逐、抢吃，吱吱地吵叫，也开始思考着这个猪场要怎样整顿才能办成养出大批壮实猪苗的卫生猪场？……唉，也许想得过早了，会成为无的放矢。还是多参加劳动，多了解情况，才能实事求是地提出办好猪场的方案。

连续几天同大家上番薯地除草，松土，然后挑肥，施肥。在与黄大祥一起干活时，他说：“去年这个时候，大家每天吃三两米，各家只好找香蕉

头、野菜补充，个个脚都肿了。无力干活，也无心干活。”黄大祥停顿了一下，瞪着眼睛看我，又说：“老吴，你是下放干部，我也不怕对你说，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比不上高级社时高，而高级社的产量又比不上初级社那个时候高。老实说，下田的肥料就是早年单干时充足。”我猛然觉得这些话，已冲抵我脑子里业已存在的“右倾禁区”，我只有默默地听着。也许这些农民兄弟，是因为我这个“下放干部”，料定不存在会有整斗他们的威胁，才敢讲这些话的。我咀嚼着——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粮产），初级社不如单干（肥料）。这不是“攻击三面红旗”么？……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在你面前的一个农民提出的申诉，你能完全丢弃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去分析一下生产关系的急速更变，究竟为何不能有实效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么？……可是，好久以来，我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判断是非的权利。

大队好象有人告诉我，黄大祥是富裕中农出身，这里面有什么……，哟，我停止想下去了。

养猪场的人员午餐后都回家。我当然是全天都在场里。有一名女社员在场里专管煮饭、煮饲料、烧火酿酒。三餐的规矩是：早粥午薯晚饭，后来改为早饭午署晚粥，每天十二两米。对于我来说，基